

韩丁：以《翻身》见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 吴耀明

教练，其间还自学了汉语。“联总”解散后，韩丁仍留在中国，去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员，起了“韩丁”作为中文名字，1948年3至8月参加了山西长治张庄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12月，第二期拖拉机驾驶员训练班在冀县举办，又请韩丁作教员。韩丁对待学员严格要求、认真负责，又循循善诱、亲自示范，细致讲解原理构造，又结合实地实物操作，创造了不少生动直观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而他在生活上是俭朴的，不要特殊待遇。1949年，韩丁被调往北京，在农业部举办的全国农机化集训班任教，后留在双桥农场任机械师。韩丁培养的学员后来都成为农机部门的骨干力量，为中国农垦和农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见证中国农民“翻身”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广泛开展。在北方大学任教的韩丁找到校长范文澜，主动要求参加土改工作组，被派往离学校不远的张庄村。1948年3月，韩丁第一次来到张庄，就被热火朝天的土改运动所吸引。在《翻身》里，他这样形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伟大时刻。”此后半年里，他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学习、一起开会，身上沾满了泥巴，心中转变了感情，让群众喊他“老韩”，俨然成了张庄的“村民”。张庄的村巷院落、田间地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韩丁把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积累了1000多页笔记，后来正是依靠这些生动而具体的记录，写成了《翻身》。

因工作辗转，韩丁背着这些重20公斤的笔记徒步越过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冒着敌人的飞机轰炸，把这些珍贵史料保存下来。1953年，韩丁返回美国，这些笔记却被当局无理扣压，几年后通过法院起诉才索要回来。韩丁用了几年时间，根据笔记资料写成50多万字的《翻身》一书，于1966年在纽约出版，并引起了巨大轰动，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畅销30多个国家，成为和《西行漫记》《中国震撼世界》并列的西方了解中国革命的必读经典著作。

《翻身》真实记录了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热情讴歌中国革命的胜利。韩丁在序言中写道：“（本书）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这场大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改造了中国，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不断地震撼着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张庄的历史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故事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通过对土改的观察，他得出结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新中国代替旧中国，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国民党失去了民众，而共产党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

对农民来说，“翻身”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总之，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韩丁在书中描述了土地改革带来的变化：“地主豪绅的势力和特权被一举摧毁后，张庄发生了迅速的社会进步，人民从来没有这样意气风发，热情高涨，喜气洋洋，信心十足。”

“他的心在中国”

韩丁回美国后仍然心系中国，一直关心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但他从不屈服，在各地发表了300多场演讲，介绍中国革命真相，让美国人民听到新中国的声音。1971年，受中方邀请，韩丁回到离开18年的中国访问，周恩来先后5次接见他，评价他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回美国后，韩丁积极奔走创建了中美人民友好协会，并任主席，1975年访华时受到邓小平接见，邓小平指出他“为中美友谊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后，他几乎年年来中国访问，前后达30余次，1985年被中国农业部聘为技术顾问，为中国农业耕作技术改革、农业机械化事业出谋划策，把国外农业先进经验、理念引入中国并推广传播，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004年5月15日，85岁的韩丁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逝世，墓地朝向东方。他常说，张庄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女儿也说：“他的心在中国。”在他的葬礼上，张庄村民敬献挽联写道：“风雨同舟精著翻身功德无量，不远方里传播友谊千古流芳。”他追求光明、热爱劳动、献身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以及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被中国人民尊敬和怀念。



中国源远流长的桃文化

□ 王雪

三月赏花，七月品果，这说的正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桃。桃，隶属蔷薇科李属，是原产于我国的古老果树之一，如今已遍布全世界，年产量达2000万吨。桃在中国不仅有源远流长的栽培历史，在文化中更是意义非凡。

中国是桃的故乡

桃，自古就备受我国先民重视。《山海经》作为上古山川地理之书，对植物分布等情况记载详细，其中对“桃”有16处，如“边春之山多萐、葵、韭、桃、李”等，证明在上古时代，我国各地就广泛分布着野生桃。《诗经·园有桃》中说道：“园有桃，其实之肴。”“园”是指栽培果树林木之所，表明自3000年前起，我国先民就意识到桃味道鲜美，是难得的佳果，并具有经济价值，便在中园中人工种植桃树。

不仅文字记载表明桃原产于我国，近代中国考古还出土了大量桃文物。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6000—7000年前的野生桃核；在河南郑州二里岗、江苏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坂、余姚河姆渡以及广西钦州独料等地，均有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桃核出土；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发现距今约3000多年的栽培桃的桃核，和今天栽培的桃完全相同；2010年云南“昆明桃”的发现，是“桃子起源于中国”有力的化石文物证据，更是将桃的演化史向前推进到距今260万年。或许可以认为，在人类出现在华夏大地上之前，桃花就已经在昆明山岗上迎着温暖的春风热烈盛开了。

然而关于桃的起源，世界历史上存在争议。有很长一段时间，桃被认为产自波斯，如桃的拉丁名

Prunuspersica，“persica”意为“波斯果”。古罗马时期，桃被称为“波斯苹果”。后来，这个名字逐渐被欧洲各国语言继承，于是就有了英语中的peach、法语中的pêche、德语中的pfirsich、意大利语中的pesca、葡萄牙语中的pêssego等等，而这些词的原意都是“来自波斯”。

这是为什么呢？公元前一世纪开始，为争夺小亚细亚统治权和东西方商路，位于伊朗高原的安息王国和萨珊王朝，先后与罗马帝国爆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公元前二世纪，备受中国人喜爱的桃树，沿着“丝绸之路”从甘肃、新疆，经由中亚向西传播到波斯。在几百年间，桃树从波斯再次出发，于公元一世纪到达罗马，后经地中海的沿岸各国，渐次传入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公元九世纪起，欧洲种植桃树逐渐多起来。公元十五世纪，桃树被引进了英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桃树随欧洲移民进入美洲，成为全球温带地区重要的树种之一。

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桃子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生产1千万吨桃子，占全世界桃产量的一半。我国知名的桃子产地有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北京市、陕西省、辽宁省、安徽省、上海市等地。北京市平谷区大桃、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水蜜桃、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黄桃等，已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无处不在的桃文化

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多种“打开方式”，被寄予了独特的“桃文化”。

桃木寓意着吉祥平安。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传说夸父追日，临死前将神木抛出化

成了一片桃林。此外还有后羿被桃木棒击杀的传说。汉时，刻桃印挂于门户，称为桃印懋，《后汉书·礼仪志》中“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桃味辛气恶，故能厌邪气。”关于桃木能避邪的传说不一，也成就了桃木成为吉祥平安的象征。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是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板。桃符演变成春联，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据史书记载，后蜀主孟昶曾经令学士张逊在桃木板上题词。张逊写完后，蜀主认为不对仗，便提笔写道：“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但此时人们依然称之为桃符。后来随着纸的出现和普及，人们便将厚重的桃木板换成了红纸张，到了明代，桃符正式以“春联”的身份亮相。

桃象征长寿。《神农本草经》说：“玉桃，服之长生不死。”两汉以后，桃被赋予了养生长寿的寓意。民间年画上的老寿星，手里总是捧着硕大的寿桃。直到今天，老人过生日做寿时蒸桃形的馒头，桃尖染成红色，以祝福老人健康长寿，已成为一种习俗。

中国文人的精神寄托

四时花映心境，如人生。桃不仅出现在生活中，更深深扎根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

《红楼梦》里的名场面“黛玉葬花”中的花就有桃花。“柳丝榆英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之所以在这里让桃花成为林黛玉的花语，是因为曹雪芹深知桃花寄托着中国文人太多悲欢与领悟，重叠着太多

文化意象。他还借薛宝钗感慨“从来桃花诗最多”。

刘禹锡在“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十年后，奉诏回京。在这年春天，他去京郊赏花，写下一首桃花诗。《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貌似写桃花，其实是讽刺无良权贵，嘲笑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这次刘禹锡被外放当连州刺史。但他依旧没有屈服，多年后，他再次复出，先后任东都尚书和主客郎中。他重游玄都观，感慨万千，却还是执着地写桃花。他在《再游玄都观》中写道：“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依旧调侃不屑，展现的是中国文人不屈不挠的风骨。

将中国文人对桃花的偏执带到更理想境地的便是《桃花源记》了。作为亲身从事农耕的士大夫文人，陶渊明热爱与纯真实朴的农民相处的田园生活。梁启超曾说：“他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正因为他亲身参加劳动，从中体会到劳作的艰苦，体会到人民的困苦，体会到饥寒的痛苦，于是美好家园桃花源就这样出现了：“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所追求的桃花源，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宜居宜业和美”的乐土。



从考古看中华先民的宇宙观

□ 隋云鹏

宇宙的本质是时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意识的产生是人类迈入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标志，从这时开始，在生产生活需要的推动下，先民开始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空间体系和时间体系，这意味着在宏大宇宙中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的萌芽。从现有考古学证据看，先民的宇宙意识或者说空间与时间意识，至晚起源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

距今万年左右的山西吉县柿子滩女巫襁星岩画，显示出当时先民探索北斗、南斗运动规律的努力，已经具有了宇宙意识或者说空间与时间意识。柿子滩岩画并列有两幅，均为赤铁矿粉等涂朱绘制，女巫襁星岩画右边是一幅人与动物画像，人在中间呈跳跃状，人体下面有圆点10个，圆点数量从左到右呈竖状二三三二排列。如果说左侧岩画中的女巫为“女媧”的话，那么右侧岩画中跳跃之人便为“伏羲”，“伏羲”下面的10个圆点可能与计数、丈量大地有关。战国楚帛书创世章认为伏羲、女媧化育万物。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显示先民已经掌握了天圆地方、斗建授时、四象主星、立表测影、二分二至等天文历法知识，构建了以北斗为枢纽的比较成熟的早期宇宙体系。安徽含山凌家滩玉龟玉版上的图像，由内（高）到外（低）依次为八角星纹、一重小圆、八条圭索、二重大圆、四条圭索等，分别代表天极（太一）、璇玑、天穹（昊天）、天柱（四维），与上

下龟甲共同组成了立体的天圆地方的宇宙体系。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中也都有大量天文遗存，如八角星纹、“介”字冠、斗魁、獠牙兽面、猪首人面、良渚神徽、北斗九星陶罐、玉琮、三环等，与天极、极星、璇玑、北辰、太一、八方九宫、洛书、八卦等有着密切关系和渊源，反映了先民构建宇宙体系的努力与思考。

太阳和月亮是早期宇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系辞上》载：“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先民通过太阳、月亮解决了日、旬、月、年、二分二至等计时和节气问题。大汶口文化时期文字“𠂔”显示了当时先民的太阳崇拜。该文字的上部图形为非常规则的圆形，象征太阳，而不是火焰的凸起部分，因此，该文字中间图形由于缺少火焰的凸起部分应为有翼鸟形而不是火形。鸟形与少昊氏“纪于鸟”的记载相符，鸟形与太阳的组合则与史前时期广泛存在的太阳神鸟考古学材料相符。太阳神鸟与下部图形五峰山组合在一起，象形至高至大的昊天，代表无上的权威，所以该文字宜释读为“昊”。太阳位于下部图形五峰山之上，很有可能是在表达一种原始历法——通过连绵的山峰和太阳运动来测定节气，这种山峰被称为“历山”，这种原始历法很有可能是传说中“连山易”的源头，《周礼·春官·太卜》载，“掌

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到了陶寺时期，随着天文历法测量技术的进步，连山被观测柱、圭表所代替。陶寺先民通过观象台夯土观测点、观测柱，测定了20个节令的太阳回归年历法。陶寺观象台、圭尺、龙盘、獠豕之牙等天文历法工具和象征，不仅证明陶寺先民有能力“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天文大地测量，也有能力“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制定历法。事实的确如此，陶寺先民不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且通过圭尺等天文历法工具，精确测量出陶寺是当时的天下之中，把天（天文）、人（人文）联系起来，构建了史前时期最为精确、丰富、成熟的宇宙体系。不仅如此，陶寺先民还把天文历法知识、工具和象征延伸运用于国家治理，发展了观象授时、居中而治、君权天授、允执厥中等古老传统，显示出浓厚的天人合一政治理念和精神境界。

先民关于宇宙体系的抽象思维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镂雕旋纹象牙梳，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先民的抽象宇宙体系及其一般运动。该象牙梳略呈长方形，长16.2厘米，宽6.1—8厘米。象牙梳上刻有阴阳爻卦画，组成了类似后世太极图的“8”字形旋纹，象征宇宙。与此同时，“8”字形旋纹整体与两个部分都可视为纯“阳爻”图案或者纯“阴爻”图案，而纯“阴爻”图案也是由纯“阳爻”图案组成，以及由于阳爻卦画与阴

爻卦画随意组合而随意变化的其他图案，体现了宇宙阴阳相生、变动不居、大化流行、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运动图景和哲学意蕴。

《尚书正义·舜典》载，“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可见，古人认为文明来源于经天纬地——也就是宇宙体系的构建。如前所述，先民很早认识到天体运行是有规律的、理性的，这种规律或者说理性是以天体守时的信、诚表现出来的。例如，太阳、月亮、北斗等天体周而复始、东升西落，为全人类兢兢业业地指示时间和节气，体现了诚信守时、大公无私、光辉文明的高尚品德和精神境界；信、诚、公、明等人文诸德是“天人合一”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具体体现，观象授时、制定历法是“天人合一”在人类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上古时期，观象授时是一项非常艰辛细致的工作，由于观象授时、制定历法的权力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这些统治者也往往因其在日复一日的观测中所表现出来的朝乾夕惕、公而忘私、兢兢业业等高尚品德和精神境界而成为圣王。

先民在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体悟、实践中，创造了天人合一理论，从而在广袤无限、无边无际、无数无量的宇宙中，为个体生命确立了人生意义。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发展，天人合一理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

